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

赋体文学的 文化阐释

许 结◎著

中华书局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

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

许 结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许结著. -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

ISBN 7-101-04727-0

I. 赋… II. 许… III. 赋-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6920 号

-
- | | |
|-------|--|
| 书 名 | 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 |
| 丛 书 名 |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 |
| 著 者 | 许 结 |
| 责任编辑 | 舒 琴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1/2 字数 244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4727-0/I·633 |
| 定 价 | 24.00 元 |
-



许结，1957年1月生。祖籍安徽桐城，生于江苏南京。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辞赋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国东方诗话学会理事。已出版《汉代文学思想史》、《张衡评传》、《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国文化史论纲》等著作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总 序

莫 砺 锋

南京大学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仅有一年,但是说到本中心的学术传统,却必须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斗转星移,如果把1914年9月由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设立的国文预科班和国文专修科视为南大中文系的直接源头,那么南大中文系已经走过九十一个春秋了。去年在庆祝九十周年系庆时,我为了回顾系史而整理了一份曾在我系任教的已故著名学者的名单,发现他们中间曾经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人竟占三分之二以上,例如:王伯沆、李审言、黄季刚、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吴瞿安、陈去病、顾实、汪东、姚永朴、陈匪石、卢冀野、胡翔东、闻一多、陈登恪、刘国钧、王易、罗根泽、朱东润、钱南扬、吴白匋、管雄、王气中、程千帆等。这些学者在南大任教的岁月或长或短,研究领域则各有专攻,但若论学风之朴实、学术之精湛,他们堪称一个志同道合的学术群体。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我系的古代文学研究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久享盛名,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曾以“东南学术”之名驰誉海内外,到八十年代以后又成为全国著名的重点学科。当然,像国内所有大学的中文系一样,南大中文系始终伴随着整个国

家的风雨历程,先后经历了抗战西迁、院系调整以及文革等曲折过程,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重返正常的发展轨道。由于我系的前身之一是民国时代中央大学的中文系,又位于民国的首都南京,所以我们比国内其他著名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更多的艰难历程。抗战时期南京沦陷且遭到严重破坏,我系仓皇西迁,本来可以大展鸿图的发展前景化为泡影。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我系又受到有意无意的压抑和削弱,在国内的地位逐渐下降。此外,我系曾是以“学衡派”为标志的东南学术的重镇,由于学术思想领域内激进的左翼倾向渐占上风,而东南学风则被主流意识形态打上了“保守、落后”的烙印,我系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话语权日渐衰微。在上述过程中,古代文学学科所受到的打击是中文系所有学科中最为深重的。尤其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厚今薄古”的整体性学术氛围、“古为今用”的指导性研究思路,都使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动辄得咎。及至后来,在“大破四旧”、“儒法斗争”等喧嚣声中,整个古代文学学科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等到阴霾散尽、大地春回的时候,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不但雄风不再,而且甚为衰微了。正在此时,年过六旬的程千帆先生应聘到南大来任教,为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注入了生机。程先生曾在南大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求学,师从黄季刚、胡小石、刘国钧、胡翔冬、吴瞿安、汪辟疆等名师,还向当时在南大的另一个前身中央大学任教的汪东、王易等先生请益,不但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老师们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正由于程先生的学术基础是在南大打下的,由他返回母校来领导重振古代文学学科的工作,在学术渊源上就与南大的传统天然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程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总结出一套特色鲜明的学术理念,由他来主持南大古代文

学的学科建设,就有条件形成较为鲜明的学科特色。于是,在程先生的主持下,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不但逐步恢复了元气,而且日益发展壮大,终于成为以成就卓著、特色鲜明而为学界瞩目的全国重点学科。

那么,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究竟有什么特色呢?简单地说,就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文学与史学沟通。先说第一点:程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呼吁运用“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后来他又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述这个理念,如“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两个层次相结合”,“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等等。说法虽异,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考证与批评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两翼,古今的优秀学者本是两者兼通的。可是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长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有的甚至互相轻视。在学术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先生可说是当代第一人。幸运的是,与程先生一起领导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对上述理念心领神会,程先生的观念成为整个学科的共同理念。三位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视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并亲自动手做文献整理方面的工作,程先生撰写了四巨册的文献学教材《校雠广义》,还在古稀之年主持编纂《全清词》。周先生费几年之功完成《唐语林校证》,还专门撰写了长达五万字的《唐诗文献综述》。卞先生长期从事清代、民国碑版的收集、整理,还编定郑板桥的全集。此外,三位先生在研究生培养中也十分重视文献学的训练,自从1979年程先生亲自为研究生讲授校雠学课程以来,这门课程二十多年从未间断,业已成为南大古代文学学科最重要的传统课程之一,一届又一届的同学们从这门课程中得到了文献学方面的严格训练。

其次,南大古代文学学科非常重视文学与史学的沟通,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不自设藩篱。古代中国的学术本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因为古代的学术文化本是一个整体,对它的研究也不宜只见一个侧面。程先生平生治学,虽然重点在文学,但也很重视史学,他在《史通》研究上花了那样多的心血,就是一个明证。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的研究工作也是文史兼通的。七卷本的《周勋初文集》中即收入了《文史探微》和《文史知新》两种著作,仅从书名就可知其性质是打通文史的。在下先生的著作中,关于唐代诗人的年谱和评传显然都得力于其兼通文史的学术功底。更重要的是,三位先生即使在研究古代文学领域内的具体课题时也经常熟练地运用史学的方法。例如程先生在研究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关系时,就得益于对唐代科举制度等历史知识的熟练掌握,从而在资料的收集、甄别以及史实的考订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并得出了不同于前贤的新说。程先生的此项研究被认为是文史结合的典范性成果,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又如周先生对曹魏集团“三世立贱”的现象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曹氏此举不但含有阻止后族干政的政治目的,而且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的这种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如果不是文史兼通,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精彩的论文来的。再如下先生关于唐代传奇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的一系列论著,别具手眼地将唐传奇置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中进行解析,从而使一些长期聚讼纷纭的疑难问题迎刃而解。凡此种种,都说明三位先生的学术研究均具有以深厚的史学功底来解决文学史问题的性质。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中青年学者也都接受了这种学术路数,而且已有不俗的表现。

岁月不居,一个学科迟早会面临新老交接的问题。薪积火传,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在于代代相传的学术精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老一辈学术带头人逐渐退出学科的日常工作,年轻的一代逐渐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由于学科的新一代成员大多是程先生他们的入室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以上述学术理念在学科内部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扬,尽管各人的研究领域及学术路数并不相同,但是脚踏实地的学风和实证性研究的课题倾向却是基本一致的。十几年来,学科成员发表的论著在数量上也许不算太多,水平也许不算太高,但是基本上都做到了言之有物、立论有据,基本上避免了游谈无根或空洞无物的弊病。在当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甚嚣尘上的大环境中,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而心无旁骛。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学术必须创新,尤其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手段的更新等方面,我们决不能因守师法而固步自封。近年来在学科内部已经孕育出域外汉籍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新的学术生长点,初步体现出开拓性的新气象,但是就原则性的学术精神而言,我们仍然坚守着本学科相沿已久的传统,我们坚信这是有利于本学科健康发展的优秀传统。

2004年1月,我们成立了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心的成员都是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成员,中心的物质条件也就是古代文学学科的原有图书、设备,此外一无所有。由于没有固定的办公用房,我们甚至没有悬挂中心的牌子。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呢?我们又为什么要以“中国诗学”作为中心的名称呢?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想合在一起回答。从表面上看,南大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是在学校的要求下成立的,是为了适应现今的学术管理体制,也是为了进一步集中学科力量、凝炼学科方向的必要举措。从本质上看,诗学中心的成立确实能发扬本学科的传统,凸显本学科的特色,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本学科的优势。众所周知,程千

帆先生的治学范围相当广泛,举凡校雠学、史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程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堪称核心的领域,那就是诗学。程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如《古诗考索》、《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被开拓的诗世界》等都是关于诗学的,此外他还编选了《古诗今选》、《宋诗精选》、《日本汉诗选评》等诗歌选本,这些诗选的选目和注释评析也都体现了程先生的诗学观点。同样,在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唐诗研究也是特别耀眼的一个闪光点。可以说,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活动中,诗学一向是最重要的领域,也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方向。我们所说的“诗学”,并不是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泛指文艺理论的 Poetics,也不是专指做诗、论诗的学问,就像唐人郑谷所说的“衰迟自喜添诗学”或朱自清所说的“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鉴赏而言”。在我们的理解中,“诗”是广义的诗,即包括辞赋、词曲等文体在内的所有韵文;“诗学”也是广义的诗学,即一切有关“诗”的研究,包括对历代诗歌总集或别集的整理、编纂(例如重编《全唐五代诗》以及编纂《全清词》)、诗人研究(例如诗人年谱、评传)、诗歌研究、诗歌史研究、诗歌流派研究、诗歌理论研究等方面。近年来,我们还有计划地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域外汉文诗话的整理、古代诗歌的文化学研究等。我们当然并不认为“诗”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全部内容,也不认为“中国诗学”这个名称可以涵盖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全部学术活动,但是我们确信本学科投入力量最多、创获最大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诗学”。所以,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虽然是新成立的一个研究机构,但是其组成情况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基本重合,其学术渊源、学术路数以及学风倾向也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完全一致。

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内部,我们一向尊重每个成员自己的研

究兴趣,很少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课题。因为我们相信,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必然是高度体现个性的,同样,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是个性化的一家之言。除了大型的古籍整理之外,我们从不奢望编写出大部头的集体著作,而情愿向学界奉献单篇的专题论文或篇幅不大的个人专著。诗学中心成立后,我们依然希望保持这种特色。诗学中心成立一年以来,中心成员完成了六部专著,它们是:莫砺锋的《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徐有富的《唐代妇女生活与诗》、曹虹的《中国辞赋源流综论》、许结的《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程章灿的《赋学论丛》、赵益的《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现在我们把它们编为一辑,交中华书局出版。读者很容易发现,这六本书从内容到写法都并不完全一致,以至于我们很难按时下惯例,为它们起一个“某某丛书”的名称,所以名为《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这六本书算是专刊的第一辑。一年前,诗学中心是静悄悄地成立的,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发布消息。现在我们对诗学中心专刊的出版也不会作任何宣传,只希望把它们静悄悄地呈送到读者面前。作为诗学中心的主任,我有责任向读者介绍中心的基本情况以及此辑专刊的由来,是为序。

2005年2月20日

前 言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赋体文学研究近来已成为显学,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然综观其成,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辞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其为赋体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是赋家赋作的研究,这是从创作论的视角对赋体文学的具体研究;三是对赋史的研究,这属于单纯的文学史与文体史的研究范畴;四是有关赋论的研究,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重要部分。上述研究成果,又主要限于对赋体文学自身的探讨,而对赋文学的产生背景与文化内涵,却涉及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赋体文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在1996年,我与郭维森先生合作完成了近70万言的《中国辞赋发展史》,在写作过程中,对辞赋文学历时两千余年的发展有了基本的了解;2001年我又完成并出版了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对赋学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2002年,我收到两份学术会议邀请,一是由洛阳大学承办的首届辞赋创作研讨会,与会者多提交自己所写赋作;二是由澳门大学主办的“都市文化与普世文明”学术研讨会,我提交并宣读的论文是《赋体文学与都市文明》。这两次会议,似乎给我一点启示,即目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全面复兴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与“盛世作赋”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社会，城市文化建设成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而中国古代较早反映都市文明的文学或文体，就是以都市赋为代表的赋体文学。

基于这一思考，于是想通过文化的视角更全面地阐释赋的产生、发展与衍变，并由此为古典文学研究拓一新境。而对赋体文学作文化阐释，既有文学与文化相关的共性特征，又有赋体文学的个性特征，这充分表现于“赋兼才学”以及赋的“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等创作特征方面。可以说，在古典文学创作领域，赋是最能体现政治文化气象，也最多地含有丰富文化制度内涵的文体，其绵延之久，几与整个封建帝国文化相始终。本人自2002年到2004年近三年间，陆续撰写了相关论文十八篇，现汇编成册，约有四类：一是有关汉赋与文化的研究；二是有关赋与诗的交叉研究；三是有关赋体文学与诸学科关系的研究；四是有关律赋与科举的研究。因属论文，似嫌散杂，然汇总其意，则试图对厘清赋体文学与政治、学术、宗教、制度、外交、科技、礼俗及艺术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有所建言。

我曾撰写《二十世纪赋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文学评论》1998年6期），对整个20世纪国内外赋学研究成就进行评估与总结，并提出未来赋学研究走向，其中有两点尤其重要，即赋的文字、音韵学研究与赋的文化学研究，本书所收论文正属于后者。当然，以“赋”体为个案，作具体而微的学科交叉（如文学艺术与天文地理等）研究，应是本书写作的主要愿望，但从其研究内涵的延伸意义看，却有不仅限于赋体的意义。比如思考赋与礼乐制度的关系，可推述礼官制度与整个文学发展的联系；思考京都大赋兴盛的历史原因，可推述古代文学与都市商业文明的关系；以及从“行人”赋诗到文学与外交关系的思考等等，在交叉研究中无疑能够拓展思维

的空间。

本书所收论文,基本已在学术杂志和学术会议上发表,现汇辑成帙,文字略有增省,其中引文征献或有重复处,则有删改。当莞之献,求正方家。

2004年6月30日

目 录

前 言	1
汉大赋与帝京文化	1
汉赋与礼学	23
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	37
汉代京都赋与亚欧文化交流	53
从“行人之官”看赋之源起暨外交文化内涵	65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	
——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79
赋体文学与都市文明	
——以程先甲《金陵赋》为例	107
论诗、赋话的粘附与分离	123
论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	139
论赋的宗教质性、内涵与衍化	159
论科技赋的创作背景与文化内涵	185

论赋的学术化倾向

——从章学诚赋论谈起	203
论艺术赋的创作及其美学特征	221
论论文赋的创作与批评	243
北宋科制与论理赋考述	261
郑起潜《声律关键》与宋代科举八韵律赋叙论	279
论清代科制与律赋批评	301
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	319

汉大赋与帝京文化

对汉王朝盛世出现的以京都描写为中心的大赋创作,文学史家或从横向的眼光考量其时代的政治意义,或从纵向的眼光考量其历史的文学价值,而缺少从文化演进的动态历程作深入的探究,以明辨其文学史、文化史乃至学术史的意义。而解析汉大赋之所以出现以及能够成为一代文学之盛,其根本意义在于大赋与帝京文化的关系,汉大赋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完型的帝京文化的形象表述。

清代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地理类”著作时,于《提要》“总论”阐明分类宗旨云:“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①很显然,在传统学人的观念中,大一统政治文化占驻首位,因而根据中国地理环境特征划分的“地域文化”、“南北文化”,均不及大一统文化为历代地志所重。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的核心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政权机制,亦即“宸居”所在的帝都,由此构成历史悠久的且为人钦羡的“封畿千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史部·地理类一·总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584页。